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胡
绳
著

99652

K25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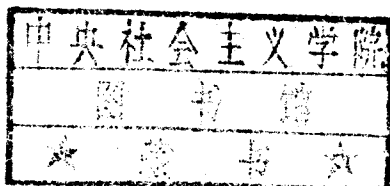


200312027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胡
绳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 -7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 重印

ISBN 7-01-002357-3

I. 帝…

II. 胡…

III. 帝国主义-侵华-历史

IV. K25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DIGUOZHUYI YU ZHONGGUO ZHENGZHI

胡 绳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52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7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9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60 千 印数:140,001—145,000 册

ISBN 7-01-002357-3/K·515 定价:10.50 元

北京七版序言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将近 20 万字的小书，过去 40 年间在人民出版社先后印过六版。在各版的版权页上都载明“1952 年 7 月第一版”。但实际上这本书的真正的初版是 1948 年 7 月在香港由生活书店出版的。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所以人民出版社出的“1952 年 7 月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北京第一版。

北京第一版对香港的本子作过些修改，增添了一些在 1948 年香港环境下不便和不能公开说的话，也有一些技术性的文字修改。有些引文的出处改用了 1948 年后出版的版本，还有个别增加的引文出于 1948 年后的文献。当时在整体上北京第一版仍保持着香港版的原貌。以后的各版也都只是作过一些文字的修改。

第六版是在 1978 年 3 月出版的。到现在又是 17 年了。六版序言中我曾说，让这本书基本上保留着 1948 年时的本来面目，现在当然更不需要多加修改。而且这新的一版（北京第七版）末尾还恢复了香港初版中的《尾语：未完成的故事》。这一段尾语在以前的北京各版中是都删去了的。

1980 年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小野信尔、狭间直樹等翻译出版了这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前此书已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的译本）。1982 年我在日本遇到这几位译者。他们说，他们

在译这本书时曾查看了香港初版开始的各版。他们深为香港版中的《尾语》所感动，因此决定在译本中保持这段尾语。我现在在本书的北京七版中恢复《尾语》，是受这几位日文译者的启发。

1995 年 11 月 1 日

2213/24

北京六版序言

这是在1947年，即整整30年前写的一本书。

那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使中国近代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刻。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①

在这本小书中所写的，虽然是一百多年前到几十年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事，但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同写书时的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它的初稿的一部分曾经交给当时坚持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们办的进步刊物，作为政论文章而发表。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的上海，这可能是发表政论文章的唯一形式。

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因此,这本书虽然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写的,但在全中国解放后,它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从1952年7月起,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直到1963年,先后出过5版。

这本书难免带有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弱点,加以写作的时间比较匆促,所掌握的材料也很有限,这本书是有缺点的。至少在有些部分,有些方面是论述得不充分和有疏漏的。在全国解放后出的各版中,做过些局部的小的修补和文字的调理。

出版社的同志和其他有些同志认为这本书现在也还有点用处,所以又印了这新的一版。这一次,也只做了些个别文字的修改,让它基本上保留着30年前的本来面目。

胡 绳

1977年9月

北京四版序言

这本书的初稿是1947年下半年我在香港时写的。当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12月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二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写这本书的用意是想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来反映出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根本的问题，企图表明在中国人民大众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传统，并表明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实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中国人民的任务。由于受写作时所掌握的材料限制，这本书只写到1924年为止。本书初次印行的序言中曾说：“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

这本书出版以后，书评家们在向读者们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曾公正地指出了它的某些缺点。作者同意这种看法：本书的主要缺点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缺少必要的分析，因而本书对于所要处理的主题，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与外国帝国主

义之间的关系，没有能深入地从经济条件上给以说明。本书中有些部分的分析表现着概念化的缺点，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这本书在香港初次印行。1952年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新排印时，我作过一次修改。现在又作了第二次的修改。这次所作的改动大部分属于核对材料，核对引文和文体上的修正。曾有好几位热心的同志把他们从本书中发现的个别错误和文体拙劣的地方一一开列给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请他们接受我的感谢。

胡 绳

1954年7月

香港初版序言

本书所处理的对象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与革命史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的一个：——在时期上只限于从鸦片战争到1925—1927年的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内容极其丰富的课题，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在处理这样的对象时，愈深入到对象中，就愈加令作者感到他所不易克服的困难。多方面的材料需要收集，各种各样的问题会要牵涉到，这是在写成初稿后又不能不给以多次修订的原因。而由于手头的资料不够和不愿把篇幅扩充过多的想法，有些想说到的问题还是略去了。在排印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些必须补充的材料却已来不及加入。暂时只好让这本稿子以目前的形式出版，希望在得到各方面的指正之后再能有加以充分修订的机会。

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曾分别在上海出版的《世界知识》和《大学》这两种刊物上发表过，但现又经过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了。好几位朋友读了杂志上发表的部分或其他部分的初稿后，提出了一些意见，使作者在修订初稿时得到很大帮助。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因为本书并非以考证史实为任务，故除了直接引用的文句外，均未注明所采用的史料的根据。所引用的文句，如不是由原书摘出，而是由别的书中转引的，就只记出我所直接根据的书名。

1948年5月

目 录

北京七版序言	1
北京六版序言	3
北京四版序言	5
香港初版序言	7
 第一章 新关系的建立(1840—1864 年)	1
一 侵略势力的东来	1
二 官、民、夷	6
三 “中立”和勒索	12
四 打和拉	18
五 军事合作	25
第二章 “中兴”和媚外(1864—1894 年)	32
一 可耻的“中兴”	32
二 政治上的控制	38
三 “老师”“学生”之间	46
四 纸老虎拆破	51
五 办“洋务”的高材生	57
六 人民的新课程	63
第三章 “洋人的朝廷”(1894—1911 年)	69
一 “瓜分”和“门户开放”	69
二 “君子”们的幻想	76

三	义和团的受骗·····	84
四	“结与国之欢心”·····	94
五	“保全主义”——保全什么? ·····	101
六	爱国和革命·····	109
第四章	“强”的人(上)(1911—1916年) ·····	115
一	不设防的幻想·····	115
二	袁世凯的“胜利”·····	122
三	真是“强”的人么? ·····	130
四	“请再高升一步” ·····	135
第五章	“强”的人(下)(1916—1919年) ·····	145
一	不清不白的关系·····	145
二	段祺瑞和日本·····	151
三	日本美国间的斗争·····	156
四	人民主流的出现 ·····	161
第六章	革命和反革命(1919—1924年) ·····	167
一	“五四”后的爱国运动(1919—1921年) ·····	167
二	新四国银行团和华盛顿会议·····	174
三	反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	182
四	吴佩孚和美国、英国 ·····	186
五	五卅前的反帝运动(1922—1924年) ·····	193
六	恐吓、收买 ·····	199
尾语:	未完成的故事 ·····	208

第一章 新关系的建立

(1840—1864 年)

一 侵略势力的东来

我们的讨论从鸦片战争(1840—1842 年)开始,但必须先简单说一下鸦片战争前的中外关系。

在鸦片战争前,北方边疆上同俄帝国间发生通商关系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曾经发生军事冲突和订立条约(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1727 年的《恰克图条约》)。在广东、福建沿海,16、17 世纪时已有欧洲资本主义原始蓄积时期的海盗式的商人来活动。葡萄牙人在 1557 年占了澳门,继之,西班牙人在 1575 年,荷兰人在 1601 年,英国人在 1637 年,都开始到中国。——这都还是在明朝的时候。法国的第一条商船到中国来是在 1660 年(清顺治十七年)。

16 世纪远东的海权和商业是葡萄牙人所独霸,17 世纪荷兰人取而代之。到了 18 世纪,英国在其东印度公司的经营下,对于远东和中国的商业已居于首席地位了。英国是进行所谓“产业革命”,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第一个国家。英国的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在这以前,欧洲各国的从事“开拓事业”的“殖民家”们,虽然在所到之处对于过着落后经济生活的人民从事抢掠与残酷的暴行,但对于远东这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统一

的大帝国还不能不有所顾忌，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掠夺和欺诈性的贸易。但是自 18 世纪中叶以后的英国的做法不同了：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们有了更大的财富与实力用来进行向外开拓的事业，同时他们有着推销不完的商品，总想使远东这个大国家成为自己的市场。因此英国向中国的发展愈来愈积极了。

但正在这时候，中国方面，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更严格地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1757 年起沿海只准广州一口同外国商船贸易（厦门、宁波、定海本来都曾开放过）。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也完全在清朝官方的控制之下。外国商人每年在广州居留的时间、住处与活动范围都须严守官定的规则，并只能同官方特许的中国商人做交易和交涉各种事件，既不能同别的商民来往，也不能同中国官府发生直接关系。1793 年，英政府特派马戛尔尼（Macartney）做特使，想直接同中国皇帝商量改进对华商务。这位大使虽然到达北京，但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为什么清朝当局采取这种政策呢？这种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正是对于 16 世纪以后欧洲的海盗商人的不法行为的一种合理的答复，另一方面，清朝政府在此时严格执行这种政策，又是出发于保卫自己的统治政权的打算。原来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封建朝代，“外患”往往同“内忧”同时出现。清朝自己就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势力，乘明王朝内部不稳时闯进关内，夺得政权的，因此他更是深谋远虑地防御来自远方的不相识的势力，尤其在他内部的统治愈不稳时，其防范也就愈为加紧。1759 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向皇帝提出《防范外夷规条》，声明其理由时说：

查夷人远处海外，本与中国语音不通，向之来广贸易，惟借谙晓夷语之行商通事为之交易。近如夷商洪任辉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而汉文字义，亦能明晰；此外夷商中如洪

任辉之通晓语言文义者，亦尚有数人，设非汉奸潜滋教诱，何能熟悉？……

伏思夷人远处化外，前赴内地贸易，除买卖货物之外，原可毋庸与民人往来交接；与其惩创于事后，似不若防范于未萌。……^①

由此可知，站在清朝统治者立场上所害怕的是外国人懂得中国情形，连外国人通晓中国语文都觉得可怕；尤其害怕本国老百姓和外国接触——认为这一切都非“防范”不可。当时，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防范外国人，其出发点是同防范本国人民一样，都是为了消弭足以危害统治权的因素。

在人民方面，虽然厌恶那种海盗面目的洋商，但是并没有排外畏新的成见。和平的国际贸易本不会为中国人民所排斥。如果后来在中国人民中出现了“排外”的心理和行动，那正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对中国实施侵略战争和经济掠夺所造成的结果。而相反的，在清朝统治者方面，本是以“排外政策”作为保护其政权的方法，后来看到这一政策敌不过外国人的炮舰时，便渐渐地转而用“媚外政策”来做他保持政权的方法了。

进入19世纪后，英国在对华贸易中仍占第一位。美国在独立建国后不久，1784年已有商船到广东。他在中国的商业进展得很快，19世纪初年已超过法国和别的国家，但还远不及英国。各国之间虽也常发生利害冲突，但对于如何打开中国的门户，是同感兴趣的。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势力最大的英国身上。俄帝国直到这时仍只能在中国北方边境从事贸易，1805年要求由海上到广州海口

^① 《史料旬刊》，第9期，第307页。

同别的国家享受同等待遇，且被拒绝。

这时，清朝统治虽还保持着强盛帝国的姿态，但内部危机已经出现了。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农村骚动的开始。在 19 世纪初年，全国各地的民变此伏彼起，虽然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但作为封建统治的基础的农村经济已经困窘，更多的农民已因生活的压迫而参加秘密结社，渐渐卷入“造反”的潮流中。官僚统治机构已经因腐化而日趋于无能。这一切现象是封建专制朝代每当快要灭亡时照例出现的。因此统治者对于外国人的要求更加深拒固绝。1816 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Amherst)到北京，想建立外交关系，不但毫无结果，清朝更因而下令不准以后再有外国使臣入京。

英国对华贸易本来是东印度公司所独占，但因为英国国内资本家大家都想参与，所以 1834 年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独占权。就在这年，英政府派了诺斐尔(Napier)为驻中国贸易监督，到广州想同两广总督建立直接关系，也遭拒绝，只好退回船上。这时，英国当局开始准备采取强硬手段了。因为在东印度公司的独占取消后，中国政府的统制和限制，在英国资本家看来，便是他们开辟远东市场的唯一障碍。如果能够打破这个障碍，别的国家自然也会表示赞助。所以纵然没有林则徐在 1839 年的严禁鸦片，战争还是可能在别的借口下发生的。

很明显的，清朝政府禁止鸦片贸易，没收企图走私进中国的鸦片，是合法合理的，而英国以武力来保护这种肮脏的贸易是可耻的行为。英国人当时不敢公开地把鸦片作为战争的原因，他们申诉中国政府给他们的商人以种种“不平等”待遇，但是任何国家当然有权在本国的海口上规定对外贸易的种种规则，英国以这借口来进行战争是毫无道理的。英国发动这个战争是以武力来推展经济的支配势力以奴役中国人民。——这是一个侵略战争。因此，当战争